



# 行旅悟道

——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

庄孔韶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庄孔韶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未名社科菁华·人类学)

ISBN 978 - 7 - 301 - 15459 - 5

I. 行… II. 庄… III. 文化人类学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6489 号

书 名: 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

著作责任者: 庄孔韶 著

责任编辑: 倪宇洁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15459 - 5/C · 05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7.5 印张 45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自序

从熟悉那种以书卷研究为职志的传统中国文人生涯,到认识另一门以行旅和参与观察以悟道的学科之特征,的确是从那些知名的人类学先辈开始的。第一次和自己的导师深入云南西双版纳腹地,看到了基诺族干栏长屋,于是丈量绘图,彻夜访谈,兴奋不已。想起硕士班读书期间读过的老书、岭南大学戴裔煊写的《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五六十年代印行的大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还有一些英文和俄文的东南亚民族志,或多或少地都对干栏住房和家族组织的关系加以介绍。其中我对于干栏长屋和家族制度的关系尤有兴趣。实习以后,我希望继续考察云南的干栏长屋,因为国外文献缺少这个地理区域的第一手记录。

一般说来,处于游耕状态的族群,较难建造大型长屋,也符合生存逻辑。实际上那里确实常见简陋竹木茅草房,便于拆迁和转移。但西双版纳所见基诺族何以擅长盖大房子?其他山地民族也是这样吗?在林耀华和黄淑娉教授的支持下,笔者多次分路线穿行云南各地做干栏长屋的专题寻访调查。那时年轻,憧憬老一辈人的学术献身精神,一直喜欢只身探访。行前仔细研读过费孝通先生和林耀华先生在大瑶山和凉山的惊险而悲情的田野记述,谁知笔者从1979年开始到1983年竟然为寻找干栏长屋,几乎走遍了云南游耕山地,涉及基诺族、拉祜族、哈尼族、德昂族(崩龙)、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十余个族群及其支系。

笔者最后的普查结果得出了“长屋”大家族干栏建筑在云南游耕山地有广泛分布的结论。其缘由在于螺旋游耕和前进游耕两种不同类别的差异所致。笔者如今留下的照片、手绘图,以及民族志见证了最近30年急剧消失的最后的干栏长屋的生活方式(那时使用了40年代产的折盒式奥林帕斯老相机),以及在中国螺旋游耕区有可能存在大家族和庞大的世系群的事实,也深刻了解了游耕作业过程和住房、世系群、仪式、祭祀和生

存心理调适等的紧密关系。后来我得知那些山地游耕社区的族群在当今遇到了困境,幸好尚有地区获得了较好的适应性发展,是值得庆幸的。

后来,建筑和家族形态关系的研究兴趣,导致了和文献上的不同地理区域的民族志资料加以比较研究,对比的体验开启了我们对这个文化多样性世界的理解。人类学提高了人在田野实况中的悟性,物换星移,穿行时空,将心比心,我们不断改善人类彼此认识的视角和综观,获得了文化实践的意义,使旅途中一切相关的人受益终生。

硕士期间的生态人类学训练和比较观察扩充了学术性联想,而联想的思路引导求学的新人适时转入新的课题,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之家回访研究就是笔者学术生涯的一次新的转换。我从林先生那里得到了《金翼》一书的英文原版和1977年的台湾宋和译本。当1983年三联决定重译金翼的时候,我和林先生的儿子林宗成商量我们两人前后各译一半。翻译的确和阅读不一样,需要字句推敲和反复回味上下文。从第一章《东林的青少年时代》开始,我就被闽东乡镇社会的日常生活画面吸引住了,一个普通农家子能够兼业成功的原因何在?一连串的故事——以文学的笔法却最终告诉读者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解说。可以说无论是从体会学说学理,还是阅读其文笔文采,都使人耳目一新。因我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可以随时向我的导师林先生讨教文中旧事,以及一个个和他的生命交流的乡村内外人等。他经常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解“金翼”群英,久而久之,我的心目中逐渐排列了一位又一位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已经不是《金翼》字面上的人物,而是被著名人类学家描绘和重拟过的,由此衍生了无数相关的时空记忆,尤其那些健在仅存的书中人物(林先生还有不多的亲属后辈来往与联系,觉得要及时会晤和访问呀!),以及总有一些问也说不清楚的陈年旧事和人物下落。你想想,即使是索隐钩沉的好奇心也会成为我追寻旧日回访金翼山谷的缘由。

于是,回访故地和发现那里人民新的生命轨迹成了我的博士生田野心愿。我开始阅读相关文献,和林耀华先生核对《金翼》中所有地名和人名之真假(这是人类学为保护文中人物之隐私而变更地名人名之隐匿术),以便我能回访闽东“金翼”乡镇时,不至于一头雾水。关于金翼回访的研究,本书已经收录了几篇最为重要的相关论文,其结论在这里我不想再次罗列,但那些写论文没有机会提到的一些事应该还有意义吧。我怎么能首次乘车从福州到古田途中就热衷于拍摄乡间的干栏大房子,的确是先期云南山地干栏长屋研究兴趣之余绪吧。我同样绘制了金翼之家和

东林姐夫家的木构和砖木大房子的平面配置。笔者想到世界各地有类同思想(例如建筑中的核心家庭平面配置格局)的族群,表面上相似,然而,人们的生态适应性总是被他们背负的不一定相同的文化哲学加以整合了,因此,我们在不同地域空间的考察,已经从生活展现的基点——每一个家庭居址出发,得到更多的内外关系理解。现在,我记录的云南山地干栏长屋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们今日的家族和世系群成员的关联状态,然而我在福建古田的研究却告诉读者那种西洋家庭结构切割式分类之不适宜性,那就是汉人社会有广泛分布的轮值的“准一组合式家族”的生活状态,一个动态的家族与亲属关系方式。

在我1983年翻译《金翼》的时候,我还不甚了解古田人的民间信仰,林先生写给外国人看的英文本也没有对地方女神具名,在笔者1986—1989年田野考察中,得知就是大名鼎鼎的临水陈太后—陈靖姑女神,所以今日三联《金翼》中译本笔者已经做了修订。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她)们头脑中的信仰与科学的不同思维总是能交叉整合,这促使我的研究从学理亦从地方哲学中寻找答案。2002年我带着我的研究生回到金翼之家的时候,祭拜陈靖姑神的香火比20年前更旺盛了,同时农家大面积的食用菌种植也稳固了阵营——达到区域产量世界第一的地位。

回访“金翼”乡镇社区,再次得到新一代金翼之家重新崛起的消息。显然,在我们再次回到旧日调查点的时候,需要重新思考多种解释性理论的有用性。笔者发现,农民社会变迁的动力除了人类学学科的解释力以外,本土易传的盛衰和察机解说可以重新拾回到区域人类学的解释系统中来,因为这是一种不得不接受地方知识的解释性力量。推广看来,是何种综合性的动力推动了地方人民的历史,仍需要一代代人不断认识。

关于田野研究的纵向与横向的理解属于方法论和方法的认识问题。笔者在《银翅》中特别提出文化的反观法(纵向)的意义。在汉人社会田野文化行为的背后,一方面,我们经常能找到缘自宇宙观、哲学、伦理和意识上的解释;一方面,关于上下文化过程的变异、协调、互补与关联性的认识——特别对人类学家而言,一个反向的观察与探索的研究途径——反观法是经常可以奏效的。至于历史人类学的当今看法,是说历史的陈述不会被垄断。人类学家参与观察中获得的知识都或多或少地导源于过去,我们的意图总是从那些书面或口传的陈述中寻求地方人民是如何组

织起来的线索,以及观察社区怎样变迁和在什么方向上变迁。

至于同时存在的,也是难于把握的调查点和面的选择问题,属于横向范畴的认知性问题。这似乎也是民俗学的问题。代际学者在漫长时日的累积性调研,如何达到通向更为广博的和深度的人类学认知,即对区域族群文化之“一览无余”和对地方人民心物构成之深掘,都需要无尽的点与面的考察与良好整合。因此“博学之智者”和“穷理之大家”显然是我们期待的人类学家之楷模。

当我们较长时间参与观察之后,文化的直觉之发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既然直觉思维是众多中国哲人从古到今一代代所擅长的认知方式,那么上述直觉的哲学根基在民间大众的土壤里可以找到吗?恰恰是人类学家有机会率先走到田野,换一个考察的视角,于是我们肯定看到直觉思维及其伴随的行为同样是汉人社会民众生活方式的重要成分,也是汉文化的一大传统特征。现代直觉研究的情形大体是,中国哲学家关注那些直觉高度发达的中国先哲经典之分析,而较少涉及民众直觉思维与行为之考察,这就给关心区域文化的人类学家留下了空间,意思是说研究区域哲学的学者也不一定非要去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显然是苛求或者说学科壁垒的限制。然而,教育和教育哲学的族群意识研究,及其教学方法的应用设计却偏偏必须关注一个区域或族群文化的教学回应之可能的类同现象。寻求不同的族群子弟学校的教学设计(甚至对日人和美国人的课堂教学设计方案)就包括课堂教学群体反应的族群差异研究,以及包括不同族群的逻辑与直觉能力的比较研究;这里关心大体相似的族群类同反应,不只是教育,也包括商业贸易对不同地理区域族群、信仰与文化类同性和差异的研究。正是在上述关注的基础上,一个族群内部长久的文化濡化过程,例如 teaching intuition 的研究等,已经成了教育设计的重要研究依据,这当然也包括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适应、发现、学习和体验文化的直觉,本书特别就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文化的直觉加以论述,也提醒人类学扩大跨学科合作研究的重要性。

在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中,中国人类学在最近十年间,尝试介入医学与公共卫生,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笔者在本文集特别提供了在戒毒工作中人类学在上述合作领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笔者主要运用两方面的人类学理论推动戒毒与疾病防治的效果,属于明显以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推动的应用性成果。个案之一,“虎日”民间戒毒盟誓仪式的考察与研究运用了人类学的整体论原则,在寻找地方族群毒品依赖

性为的社会文化原因的同时,考虑建立不同于科学的方法论的另一种方法论,即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小凉山彝族运用强大的习惯法与仪式、家支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等集合的文化力量,战胜人类因吸食毒品造成的生物性的成瘾性,呈现了中国戒毒成功率最高的个案之一。个案之二,是对流动人口中的性服务者组织特征的调研。从2005年以后,渐渐在参与众多疾病防治项目中,发现运用组织人类学理论的有效性。这是以多年对照汉人和少数民族民间组织方式的类同与差异性为出发点,将特定的族群的和区域的性服务者群体“作为一个文化的组织”,针对性服务者的乡村—城市流出地串连特征、“红灯区”驻在组织特征和进一步移动的群体特征等,调研性服务者的行为方式背后的文化特征,从而在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干预措施上为公共卫生专家提供可行的对策依据,已经成为卓有成效的公共卫生与人类学家成功合作的样本之一。

影视摄制和人类学的结合,特别是田野研究文本和照片或电影摄制的合璧作品越来越普遍,说明文字和影视载体不可或缺的状态。这并不单纯是数码技术普及的唯一结果,其本质在于文字撰写与影视表现之不可替代性,各自的独立性与互补性,以及由此建构对不同文化的更为深刻的理解。目前人类学界卷入人类学影视摄制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已经在多样化的影视摄制实践中看到,如同文字的研究报告或专业论文那样,作为透过镜头的人类学的文化的诠释,同时,开启同人类学的利用之努力相比拟的“应用的影视人类学”(applied visual anthropology)<sup>①</sup>事业。实际上,唯有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的学术实践才是有前途的,文本的或影视的文化诠释与应用概莫能外,人们穿梭于学院派的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之间,将不断推动中国人类学未来的健康发展。

在这本文集的最后部分,属专题学术笔汇。最近几年多次参加学术专题座谈、笔会,收集起来的短稿也不下十余篇。这类发言拘束较少,兴趣所至,即时发挥,沙龙的好处便在于此。聚会之后,编辑们总希望把那些即兴的、不成文的发言整理一下发表(有的篇幅已经改作了序言或导言)。这类短稿的特点是保持了原初言论的直率,又不用过多的注释和引证,被认为是沙龙火塘上方的火花,需要保存起来,以便逢时扩大思考,并

<sup>①</sup> Sarah Pink, *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 Engaging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81.

不单为论争。眼下笔者挑选了十个短篇,说东道西,放在这本集子的最后,以飨读者。

庄孔韶

2008年7月25日

于北京景山老宅



• 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 •

# 目 录

## 第一编 乡土研究

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 .....	( 3 )
陈靖姑传奇及其信仰的田野研究 .....	( 36 )
近四十年“金翼”黄村的家族与人口 .....	( 56 )
黄村轮养制和准一组合家族 .....	( 74 )
“金翼”黄村山谷的风水实践 .....	( 79 )
金翼家族百年过程的学术研究要义 .....	( 86 )
中国乡村人类学的研究进程 .....	( 141 )

## 第二编 发现实践

“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	
——兼论影视人类学片的应用新方向 .....	( 177 )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新态势和人类学理论原则之运用 .....	( 206 )
可以找到第三种生活方式吗?	
——关于中国四种生计类型的自然保护与文化生存 .....	( 222 )
中国西南游耕民族的大家族与干栏长屋	
——1979—1982 年的田野考察实录 .....	( 233 )
长江三峡民族民俗文物保护及其实践	
——兼谈人类学、民族学之角色呈现 .....	( 262 )

——文化连续性、文化比较和文人角色 ..... (278)

### 第三编 方法论说

文化的直觉论 ..... (299)

历史人类学的原则 ..... (320)

#### “蝗虫”法与“鼯鼠”法

——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取向评论 ..... (329)

#### 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寻觅

——由明代“公安派”的文论引起 ..... (358)

今日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 ..... (365)

影视人类学的理念与实践 ..... (372)

### 第四编 学术笔汇

文化自主性的含义 ..... (393)

试试阅读弗里曼 ..... (398)

作为学术视角的传统 ..... (403)

文化生存、文化保护及其运用 ..... (406)

重建族群生态系统 ..... (410)

杨柳青乡治与商镇之复合研究 ..... (416)

作为文化的组织 ..... (420)

现代临终关怀的文化检视 ..... (424)

• 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 •

# 第一编

## 乡土研究

# 回访和人类学再研究的意义

## 一、回访和人类学的再研究

### (一) 回访的非人类学视角

#### 1. 诗人和诗的启发

诗人常常在经历了重大的人生或社会变故后,重访或回访某个在脑海里留有特别记忆的地方(间隔常常不是一个太短的时间),因感物感人而感慨见于诗文。杜甫50岁前,从甘肃经长安翻山越岭到成都。杜甫漂泊西南天地间,重游新津县东南五里的修觉寺,写有《后游》一首。“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诗中有准确的游踪记忆,对旧地重游感觉到的自然风物变化观察细腻。在笔者所阅读过的有限的中国古典诗词中,除了见到古代文人在植物分类知识上出错以外,常常感到他们对所见空间气象的变化刻画入微。杜甫的这首《后游》就是如此,诗人长久留恋于静静移动的美景。如同古代诗人诗作的经常的归宿那样,从自然的外在而流入内心,原来诗为了一解乡愁。诚然,杜甫的这首诗和人类学几乎毫无关系,但我们关心的是他的诗的意境是如何唤起读者的旧地重游的体验的。人类学看待诗的叙述类型就是引导读者“经历他人的体验和引起共鸣,并借助隐喻的效力,以达到更深层的认识人类自身的目的”<sup>①</sup>。笔者在1986年回访金翼黄村之前阅读过的五代南唐古田诗人徐仁椿的还乡诗<sup>②</sup>,就是在故人和今人之间做类同场景的人文的与文化的比较的体验。

#### 2. 历史学家追踪文学家

关于19世纪法国的农村研究,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有一篇是直接对应小说家巴尔扎克《乡村医生》的。由于深知历史学家和

<sup>①</sup>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0页。

<sup>②</sup> 参见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6页。

人类学家的工作,他仔细对照和探访了巴尔扎克小说描述过的法国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景观与农村风物细节,并加以评论。一结合小说细节,方知做农村研究的历史学家的确不同。他是从学术上的原则看待小说家内容的。拉迪里发现了不少巴尔扎克常识上的错误,例如《乡村医生》中,阿尔卑斯山冬季不拾柴(应为秋季);拉迪里还发现巴尔扎克缺乏应有的谨慎,“毫不犹豫地把阿尔卑斯山区的木瓦、安茹省的石板瓦、普罗旺斯的砖瓦统统混合在一起,放在萨瓦和多菲内的屋顶上”<sup>①</sup>,这样的知识性错误还有多处。巴尔扎克过于简化了对那里乡村结构的介绍,看得比拉迪里脑中的俄国新民粹派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定义的“小农经济”还简单。但拉迪里仍然赞扬巴尔扎克的才华:“他以极快的速度研究了一两个山区或农村地区。这时,他凭着强烈的直觉,已经意识到了这所有的一切。远在阿尔伯特·赫希曼赫、克利福德·格尔兹用学术性更强的术语表达出来的这个现在已经是自明真理以前,巴尔扎克早就对此有了认识。”<sup>②</sup>这是指巴尔扎克当时就发现了现代学术大家关于“发展并不是通过习性的某些突然变化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着的一些因素发挥作用,将其自身引向了经济增长”<sup>③</sup>。

作为研究农民社会的拉迪里在学术上这样评价巴尔扎克,他“是个不够严谨的人类学家,也是个很不准确的地理学家,但凭着他那一流记者的以及人类学综合的开拓者的犀利目光弥补了这一不足。当他匆匆经过阿尔卑斯山区的时候,眼光飞快地一扫,便抓住了真正要害的问题,为了让住在城市里的读者便于了解,将一些零星的观察集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sup>④</sup>。“《乡村医生》仅仅强调了源于农村需求和习俗的简单技术所具有的重要性。”<sup>⑤</sup>因此,“尽管巴尔扎克具备某些特别敏锐的洞察力,但他依然处在农村社会这个主题的边缘上”,“巴尔扎克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牵着我们的手,将我们带到神秘的农村的村口上,却没能让我们一览无余”<sup>⑥</sup>。

拉迪里追踪巴尔扎克小说是在告诉我们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以及人类

① 拉迪里:《巴尔扎克的〈乡村医生〉:简单的技术和乡间传说》,见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

② 同上书,第186页。

③ 同上书,第185—186页。

④ 同上书,第190—191页。

⑤ 同上书,第192页。

⑥ 同上书,第191页。

学家的不同之处,其决定性的差别在于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是以该学科的理论方法与原则支配的,而我们多数情况下在小说家的作品里看不到明确的学术理论的提携。只要我们把视线移到人类学家写的小说,如林耀华的《金翼》上面,我们马上能从他对闽东农民家庭住房格局的细节描写,从他对民间节庆仪式过程的描述,从他对一些乡村事件的描述体出人际关系的奥妙,看出人类学理论是如何从人类学家的小说笔法中呈现出的,巴尔扎克正是缺少这一点,尽管他是法国的大文豪。

## (二) 回访的人类学传统

### 1. 弗里曼质疑米德

在世界急剧变化的 20 世纪,如果间隔数十年后回访旧地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真正比较难于评论的是米德 1928 年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sup>①</sup>——一部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她把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同美国人做比较,发现那里不存在一个通常需要经过的“焦躁与不安的时期”。米德认为那是因为青春期的变化并非只受生物性控制,而且还受文化的制约。然而米德去世后,她的书受到澳大利亚人弗里曼的严厉批评。弗里曼对萨摩亚人同样有广泛的田野工作经验,写了一本书《米德与萨摩亚人》,认为米德年轻时在萨摩亚做的极小规模田野工作是不足信赖的。米德当时发现萨摩亚人的性行为比起当时的美国人来说是纵欲的,然而,弗里曼看到 20 世纪 40 年代及其以后的萨摩亚人并非纵欲过度,尽管有私下的性行为,但还是要受到公共道德的约束,有时还有对这种性行为的处罚,并认为他们可能有比人类学所记录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更偏激的贞操观。

弗里曼认为,米德的萨摩亚语只学过一个半月,不足以做田野沟通;还认为米德因年龄限制,无法参加一些重要仪式。她的访谈对象也半数未过青春期,不能当做从青春期向成年转变的样本。弗里曼认为,青春期发生的生物性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青少年的行为,而米德过分依赖她的老师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决定模式考察萨摩亚人。<sup>②</sup>

显然,这一争论本身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人们首先注意到,第二次

<sup>①</sup> Margaret Mead, *Coming of Age in Samoa*, New York: Morrow, 1928.

<sup>②</sup> Derek Freeman, *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世界大战后萨摩亚人的居住地变化很大,几乎有一半人已不在岛上生活,因此弗里曼与米德的争论偏重过去而非现在。然而,如果是做前后对比性考察又如何评价呢?

美国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百科全书》这样评论:“从比较的方法看,萨摩亚人的性行为并非如米德或弗里曼描绘的那样偏激,在世界上众多文明中,萨摩亚人并不像米德认为的那样性放纵,也不像弗里曼所认为的那样受限制。当然,萨摩亚人对性行为所持的态度是处于性自由和性压抑的中间状态。弗里曼关于萨摩亚人比其他文化中的人更具保持童贞态度的偏激说法未能得到跨文化研究的支持。”<sup>①</sup>然而,“弗里曼的贡献在于他对这种公共道德制约的描述以及因羞涩和与性行为相联系的危险而导致了秘密性行为”的解释。弗里曼指责米德忽视生物性而强调文化的观点是一种误导,但实际上弗里曼关于生物性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假设,米德本人也接受。<sup>②</sup>

这是人类学史上最激烈的一次学术争论(越出学术界而见诸美国各大报章),然而上述评论又是我们看到的最为中庸和缓的述评。这显然并不单纯,因为弗里曼和米德争论涉及的问题和方面太多,诸如田野工作的质量、立论的根据、撰写的可信度、时空关系、大学者的声誉、学术圈内外的多种认同。也不单纯如同澳大利亚选手和美国选手的网球公开赛,涉及国别外还有地域、族群和历史渊源等。弗里曼和米德的学术争论并没有结论,然而我们从中引申出的问题不在于谁是谁非,而是人类学者如何不断改善观察—撰写的整个认识流程,建立和把握田野民族志撰写的新方向。<sup>③</sup>

## 2. 韦娜回访特罗布里恩德岛

在世界人类学的回访研究中,又有哪些问题是和人类学家本身的着眼点有关系呢?在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做完田野工作60年以后,人类学家韦娜(Annette B. Weiner)<sup>④</sup>从1971年后五次回访马氏去过的同一个岛。她发现,由于当地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响,马林诺夫斯基虽说

<sup>①</sup> Paul Shankman, “Mead-freeman Controversy”, *Encyclopedia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edited by David Levinson and Melvin Ember,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6 Vol. 3, pp. 757—759.

<sup>②</sup> Ibid., pp. 757—759.

<sup>③</sup> 参见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第520页。

<sup>④</sup> Annette B. Weiner, *The Trobrianders of Papua New Guine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3.

注意到妇女在岛上的较高社会地位,但他认为这是由于母系继嗣社会的谱系作用。实际上,在当地的经济交换中,妇女用香蕉叶和香蕉纤维制作裙子一事,表明妇女在当地的的生产活动与经济交换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而马林诺夫斯基忽视了当地妇女在政治经济学与交换体系中的作用。从民族志的角度看,韦娜和马林诺夫斯基二人的调查资料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时空变化后的理论、视角与性别关注不同。在马氏的描述中,岛上妇女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下,而韦氏的调查认为岛上妇女也在其阴影以外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当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性别角色不应忽视(尤其在人类学家以男性偏多的情况下),于是韦娜回访研究的学术意义便在于重新发现女性的田野视角。

似乎上述回访两案均有再次检视以往人类学工作的问题的意义。对观察失误的质疑本来就是学术进步的要求,这和主观性的“真实”与否的观察有时不是一回事。如马海云、周传斌对杜磊调查过的回族社区纳家户村的再研究,证明纳家户村根本不是苏非教派社区,先期调查者“忽略了不同职业群体的生活习性和季节性差异,访谈的对象也仅限于个别老人。可见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还相当隔膜”<sup>①</sup>。但回访的前后对比的研究,则上述两种情形都有。前者用于对知识失误的订正,涉及加强学术的可信度;后者在于跨时空文化的观察与诠释,属于人类认识综观的递进。还有一种回访的经历是需要给予注意的,特别是数十年间的社会文化变迁中人类学须看到文化再造和知识再造的内容。博罗夫斯基(R. Borofsky)对萨摩亚岛普卡普坎人的研究<sup>②</sup>告诉人们,20世纪70年代那里新出现名为Akatawa的制度,普卡普坎人却说是本族固有的先祖遗制。博罗夫斯基正是需要对照先前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才得以发现这个“再造的传统”。博罗夫斯基因“温故”才得以“知新”。<sup>③</sup>

① 潘守永:《“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R. Borofsky, *Making History: Pukapukan and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同①。